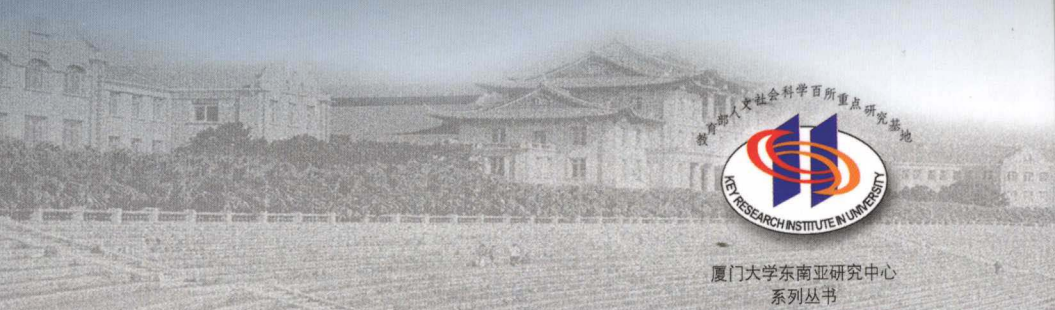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二十二.....

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 (1965—2005)

曹淑瑶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二十二

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 (1965—2005)

曹淑瑶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1965~2005/
曹淑瑶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7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5-3492-2

I. 国… II. 曹… III. 中文-高等教育-研究-马来西亚-1965~2005
IV. G649.3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087 号

责任编辑:薛鹏志

封面设计:洪祖洵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庄国土

副主编 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勤 庄国土 沈红芳 吴崇伯

陈福郎 林 梅 侯真平 聂德宁

蒋细定 廖大珂

序

随着 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揭开了近代西力东渐的殖民历史。英国自 19 世纪初叶确立其在马来亚地区的殖民主权后，积极自中国沿海及印度南部招募劳工开发马来亚，奠定今日马来亚地区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英殖民地政府对于境内各族群的统治，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放任各种族自行管理所属的族群，并由于吸取殖民印度的经验，对于境内各族群的教育并不热衷，初时仅给予马来学校和英文学校津贴，对于境内为数众多的华族子弟的教育需求则予以漠视，于是华族仿照祖国的教育模式，开始自办学校，提供中小学教育，并鼓励子弟返国接受高等教育。

近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重要目标的民族主义，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逐渐影响亚洲各地。清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无力抵御，对于流寓海外的华族无力保护的历史，激起海外华族民族主义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乡中国的五四运动曾在马来亚地区引起华人的热烈回响，因而导致英殖民地政府开始监控与压制本地区的华文教育。而马来亚境内另一主要族群——马来族，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威尔逊所提倡之“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下，亦发展出马来土著民族主义。二战后初期，由于华族对于马来亚政治变化感到疏离，华、巫两族间屡屡发生的暴力冲突，使得华族的国家认同受到质疑。当新兴的马来民族主义分子逐步取代英国，获得本地区的政治主导权后，一种意图以统一的语文，消除境内其他族群的文化遗产，以“同化”的方式，凝聚全马来亚为一坚强的政治实体，成为一个以马来语言、文化为主流的国家观念，在经历马来亚自治、独立建国的过程中，

逐步落实在国家教育政策里,并在中等以上教育将华语文排除在正式教育体系之外。

华文教育随着近代华族迁移的脚踪而散布海外,虽曾蓬勃发展,却也在当地政权的歧视下逐步衰落,唯独马来亚地区的华族因视华文教育为民族文化的体现,迄今仍努力维系其华文教育的存续与发展。然而华文教育处在这个经历过不同民族统治的地区,具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时空环境里,却在单一国族建构概念下,已超脱单纯的文化课题,成为棘手的政治议题。虽然现实的处境艰难,马来(西)亚华族社会为能建构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满足华族子弟追求高深学问的学习心以及获取大专文凭的愿望,仍努力争取申办大专学府,不论是1955年在新加坡裕廊正式开学的“南洋大学”、1968年倡议的“独立大学”,乃至1990年开办的“南方学院”、1997年由董教总创立的“新纪元学院”,以及1999年获准成立的“韩江学院”,都是马来亚地区华族社会重视母语教育的实践。虽然马来西亚华族倡议的独立大学无法实现,但今日马来西亚华族已办成三所学院,这三所学院不但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且皆辅以巫、英两语,提供以实用为目的的课程,帮助本地区华族子弟适应与生存,这些努力在在显示马来西亚华族社会能衡量现实环境之需要,作适当的调整,致力于消弭华、巫两族间的潜在摩擦,并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事实。

曹淑瑶博士为吾任教东海大学历史系大学部及研究所时之学生,十多年来,与吾合作完成有关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之学术论文多篇,后在吾之建议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专注于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之研究。曹博士所著《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1965—2005)》,为一本探讨今日马来亚地区华族如何因应时代的变局,在单一语文教育的前提下,争取民族文化生存契机的专著。曹博士除能将以以往参与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外,更利用多次前往马来西亚参加研讨会的机会,收集、核对资料,且实地参访其研究标的之学院及马来西亚华校董教总总部,面访董总前后任主席、各学院院长、行政主管以及教学人员,并对各学院学生做问卷调查,成果

丰硕，故本书除可提供各界对马来西亚华族之母语教育，乃至今日之马来西亚社会有进一步之认识，且可为日后学者对马来西亚做更深入研究的基础。本书内容丰富充实，故乐为之序。

古鸿廷

2009 年冬

于台中大度山

目 录

序/古鸿廷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战后初期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	(12)
第一节 战后初期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南洋大学的设立	(12)
第二节 独立前马来化国家建构下的华文教育	(18)
第三章 筹而未建的独立大学	(34)
第一节 独立大学筹设的缘由	(34)
第二节 独立大学的筹设与论争	(38)
第三节 独大运动	(46)
第四节 独大诉讼案	(54)
第五节 结 语	(71)
第四章 柔佛新山的南方学院	(76)
第一节 宽柔专科班的设立	(76)
第二节 南方学院的设立	(87)
第三节 南方学院的学制与课程规划	(103)
第四节 结 语	(124)

第五章 吉隆坡的新纪元学院	(126)
第一节 董总与新纪元学院的设立.....	(127)
第二节 新纪元学院的组织架构.....	(135)
第三节 新纪元学院的课程规划与教学研究.....	(144)
第四节 新纪元学院的校园文化.....	(161)
第五节 结 语.....	(167)
第六章 檳城的韩江学院	(169)
第一节 韩江中学的新闻专修班.....	(170)
第二节 韩江学院的设立及课程规划.....	(178)
第三节 韩江学院的国际教育合作.....	(195)
第四节 韩江学院的校园文化及发展策略.....	(199)
第五节 结 语.....	(204)
第七章 结 论	(206)
附录一 1920 年英属三州府学校普通章程	(213)
附录二 1926 年学校注册法令	(217)
附录三 1959 年全国华文教育大会	(226)
附录四 马来西亚独立大学发起人大会议宣言	(229)
附录五 马来西亚影响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人物简介	(232)
参考文献	(241)
跋后语	(261)

第一章

绪 论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出现的观念,出现的初期,原在分辨各族群间的异同,民族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虽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着重在文化层面而不涉及政治意涵,^①但民族主义却急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名词,强调民族自决的权力,人民具有决定他们所属的民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民族成为所属人民效忠的理性目标,^②民族主义已成为近代文明里的主要特征,18世纪以来,由知识分子及政治领袖强调具有共同独特的文化与语言的民族应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观念,逐渐为人类所接受,民族主义今日已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③以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重要目标的民族主义随着西力东渐,逐渐影响亚洲各地,中国在列强侵略下,以涵盖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自清末兴起与发展,海外华族民族主义也因华族的觉醒而出现,自19世纪末开始,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随着华族人数的增加与族群意识的崛起而萌芽及发达。

①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58, p. 10.

②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p. 11.

③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pp. 288~28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萌芽的马来土著民族主义,^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为压制华族的反日行动,在日本占领军鼓励下急速发展,^②战后重返马来亚的英殖民地政府,在面对马来民族主义时,在教育上采取英语文与巫语文(马来语文)并重的模式,而将华语文排除在正式教育体制外。独立后主导今日马来西亚政局的马来族群承续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独尊巫语、辅以英语,而在中等以上教育将华语文排除在正式教育体制之外。^③ 由于马来亚^④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都相当特殊,独立后在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也因而非非常复杂。

① 有关马来土著民族主义的萌芽,见 W.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178~247.

②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见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29 页;廖小健:《日军统治对马来亚民族关系的影响》,《世界民族》2001 年第 1 期,第 48~54 页。

③ 相关资料见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 1960,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60, paragraphs 66~67, 177, pp. 15~31.

④ “马来亚”(Malaya)一词,可以是一个地理名词,也可以是一个政治版图的名词。在地理上,它意指马来半岛这整个地理区域(geographical area),范围包含今日马来西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的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霹雳(Perak)、雪兰莪(Selangor)、森美兰(Sembilan)、马六甲(Melaka)、柔佛(Johor)、吉兰丹(Kelantan)、登嘉楼(Terengganu,旧译为“丁加奴”)、彭亨(Pahang)等位于马来半岛上的 10 州及槟榔屿(Pulau Pinang)、新加坡(Singapore,亦可译为“星加坡”,简称星洲),见许云樵:《马来亚地理》,新加坡:世界书局 1963 年版,第 1 页。在政治上,随着二战后英国殖民势力慢慢淡出,马来半岛及槟榔屿于 1948 年 2 月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马来亚联合邦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马来亚”一词遂带有政治意义,范围只有今日马来半岛的 10 州及槟榔屿,不包含新加坡。

· 马来亚位处于大陆东南亚和岛屿东南亚^①的枢纽位置,气候湿热多雨,且天然资源丰富,由于半岛地形崎岖,山地多平地少,有许多尚未开发的热带雨林,^②使得当地交通不便,不利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以前,马来亚是一个小邦林立的地区,^③而且在文化上,深受到印度、中国及回教文化的影响。从公元4世纪起,马来亚一直受到邻近苏门答腊、爪哇和印度支那半岛的强国所支配,直到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的建立后,才有一个较为强盛的独立王国。^④1511年8月,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为马来亚的历史展开新页,开启了这个地区长达400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时期。1641年1月,荷兰人攻下马六甲,结束葡萄牙人在马六甲为期130年的占领,也接手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香料贸易。然而,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着重于商业利益的争夺,以贸易进行垄断和剥削的殖民模式,并未对马来亚造成深刻的影响,反而是1786年占领槟榔屿的英国人,因1824年“英荷协定”(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的签署,将马来亚地区置于其势力范围后,透过海峡殖民地总督(Governor)、参政司(Resident)、顾问官(Advisor)等新的统治模式的建立,逐步加深

① 东南亚(South-East Asia)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名词。许云樵认为“东南亚”一词是源于二战期间盟军所划分的军区,包含东经60度至110度之海域以及锡兰、缅甸、暹罗、马来亚、苏门答腊等地,战后始包含中南半岛及菲律宾等地。见许云樵:《南洋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61年版,第4~5页。

② 有关马来亚的地理环境,参见许云樵:《马来亚地理》,第1~36页。

③ 许云樵认为这种小邦林立与分散的局面,是马来亚早期历史的特色。许云樵:《马来亚史》,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年版,第15页。

④ 马六甲王国虽曾一度控制整个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东部,但暹罗始终未曾放弃其对于马来亚北部的控制权,几度出兵南侵。一直要到1909年“英暹条约”(The Anglo-Siamese Treaty)签署后,暹罗才放弃其对马来亚东北部之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地的控制权。罗肇德、黄今英主编:《新马史》,新加坡:胜利书局1976年版,第17~18、68~72、89页;郑瑞玉、马季勋等编:《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马来西亚雪兰莪: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课程局1999年版,第113~114页。

其对马来亚土邦的控制,^①也深深地影响了马来亚地区的发展。

英国对于马来亚的控制,着眼的目标也是在于经济利益的攫取。英国人为了提升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积极开发马来亚丰富的天然资源,如开采金矿、锡矿,并利用马来亚高温多雨,地力肥沃的条件,种植甘蜜、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由于当时马来人(或称“巫人”)人数较少,^②为了解决开垦所需的劳动力,英国人自中国和印度大量招徕劳工。新移民的加入,带来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为了便于管理多元种族所构成的人口,英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统治方式,在不危害英国之经济利益与政治统治的前提下,放任各种族自行管理所属的群体。英国人的统治虽然对于马来亚的现代化贡献很大,但“分而治之”的政策却造成当地种族间的隔

① 英国在控制马来亚初期,对于马来半岛各土邦的事务,基本上是采取“不干涉政策”。1874年1月,海峡殖民地总督召集华人私会党领袖及霹雳土邦的主要酋长们出席会议,协调华人私会党在拿律的纷争和霹雳苏丹人选,于1月20日签订《邦咯条约》(The Pangkor Engagement),将霹雳纳为英国的殖民保护领地,由英殖民地政府派遣参政司处理其内政,自此英国开始干涉马来土邦的内政,并逐步并吞马来诸土邦。有关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态度之转变,参见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8, pp. 551~567; 聂德宁:《试论“邦咯条约”的签订及其后果》,《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87~93页。

② 在西方势力殖民马来亚以前,马来亚的人口极少,只有马六甲一地的人口较多。见许云樵:《马来亚近代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63年版,第202页。

闾,形成马来亚独特的多元化社会形态。^①

19世纪中叶时,霹雳的拿律区(Larut)发现丰富的锡矿脉,引起采锡热潮后,许许多多廉价的华人劳工大批涌入,壮大了马来亚华族人口的规模,^②使得马来亚成为海外华人主要的聚集地。^③然而,英殖民地政府始终视华人为外国人,^④当英殖民地政府开始注意到殖民地人民的教育时,只给予马来学校和英文学校津贴。^⑤由于英殖民地政府不热衷教育华人,华人开始自办私塾学校,教育子弟。在二

① 张晓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研究》,桃园中坜: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第21页。巫、华两族在英殖民地政府刻意安排下,不但居住环境分开,工作项目也不同,例如莱佛士与柔佛王国于1819年签订的“新加坡之处理协约”第2条就规定:“凡华人迁居河之对岸,由大桥起至河口止;马来人及图盟果等则迁至大桥口起至河流发源处止。”见朱镜宙:《英属马来半岛》,台北:乐清朱氏咏莪堂1978年版,第12页。在工作方面,华族除商人外,泰半为矿工、橡胶园或咖啡园工人,而巫人则多半为居住于乡间的农人。有关英殖民地政府治下的马来亚境内各族群之情形,见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p. 558 and 565~576;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年版,第52~55页。

② 1849年,马来亚的华人约27988人,但1881年时已跃升为174327人。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26页。

③ 在1931年,马来亚的华族人数约达1709300人,是仅次于暹罗之后,海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324页。

④ 英殖民地政府会有这种看法,与当时华人强烈的“落叶归根”心态不无关系。陈达引用“富贵而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句古谚来形容二战前海外华人如“光景富裕者,往往以归故乡为荣”的心理。见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版,第118页。

⑤ Federation of Malaysia, *Malaysia Official Year Book*, 1966, vol. 6,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ess, 1968, p. 329. 长期担任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官员的巴素(Victor Purcell)也表示:“马来亚政府是被英巫教育的事务所占据;华校即听其自行设法。”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人史》,槟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版,第160页。

战以前,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可以说是原乡中国教育的延伸,^①教书的老师 and 上课用的教材,皆来自中国。^② 由于海外华族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逐渐发展,一次大战后,英殖民地政府感受到华人可能带来的威胁,^③开始干涉华文教育的兴办。^④

在英控制马来亚地区近 100 多年期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巫、华两族少有接触,也少有冲突。^⑤ 第二次

① 陈育崧:《椰荫馆文存》第 2 卷,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3 年版,第 232 页;许云樵:《马来亚近代史》,第 206 页;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6;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2006, p. 160.

② 战后英殖民地政府的首任提学司芝士曼(H. R. Cheeseman)曾表示,直至 1948 年时仍有 50% 的华校教师来自原乡中国,见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p. 31.

③ 自 1920 年代开始,英殖民地政府产生华人可能在马来亚地区建立“国中有国”的恐惧,对华人的政治活动及文化逐渐给予限制,见 Hung-ting Ku, “British Colonialism verse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4, Parts 1&2, July, 1989, pp. 91~103.

④ 英殖民地政府分别于 1920 年、1926 年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条例”(The Registration of School Ordinance of 1920)和“1926 年学校注册条例”(The Registration of School Ordinance of 1926),意图以津贴为控制华校的手段,并自 1930 年起屡屡宣布禁止华校使用“含有煽动性的材料或者有煽动族群仇恨的材料”的教科书。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56 页;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人史》,第 162 页;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pp. 68~84.

⑤ 曾于 1918 年、1920 年、1921 年三度到新、马两地工作、游历的朱镜宙,观察当地巫、华二族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关系,说:“今英人方注全力以教育同化土人。然英人所能为力者,后天之文字;英人所不能为力者,先天之色素。惟吾华人,色相不殊,处境亦一,情感素孚。”朱镜宙:《自序》,《英属马来半岛》,第 4 页。

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度占领马来亚地区,为巩固其对该地区的统治,分化原本融洽的巫、华关系。日本的占领军政府,除致力丑化英人之形象外,^①刻意挑拨巫、华两族间的族群意识,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华校被迫停办,直到战争结束才得以复校,^②且日军数度发动“大检证”,屠杀华人,并强迫华人缴纳巨额的“奉纳金”;但日军对于马来人却采取笼络的手段,一方面承认马来亚各州苏丹的特殊地位,保留警察和民事服务部门的公职给马来人,利用马来警察来维持非马来人社会的秩序和协助对抗游击反抗活动;另一方面则释放被英殖民地政府囚禁的马来青年会领导人,并在战争结束前夕,利用马来民族主义分子的反英情绪,组成“半岛印度尼西亚人民协会”(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简称为 KRIS),承诺给予马来人独立地位,以获得马来族群的支持。因此,日据时期马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煽动,马来土著民族主义急速发展。^③

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地区的土著民族主义并未消失,反而更加发展。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华、巫两族群紧张的对立关系,立即爆发

① 有关日本占领马来亚对英人形象与地位的打击,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55~56页。

② 有关日本占领期间及战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情形,参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年版,第412~433页;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年版,第1~46页。

③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 831. 有关日军在马来亚的统治对于华、巫族群的影响,参见郑瑞玉、马季勋等编:《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第209~212页;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第28~29页。

出来,全马各地出现了种族间的私斗,加深华、巫间的冲突。^①然而此时大部分居住在马来亚的华人却对政治变化感到疏离,^②因而使得华人的国家认同受到质疑。^③英国殖民地政府存在着一种怀疑非马来族群将有害马来亚之生存的恐惧,于是一种透过教育的方式来形塑马来亚国家认同的观念逐渐形成。1951年,以巴恩(L. J.

① 前新加坡驻日、韩大使李炯才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日本占领马来亚地区期间曾刻意挑拨华、巫两族的冲突,战后初期,“受过日军逼害的人,到处搜寻曾与日人勾结者私下报复”,这些冲突“促使马来人团结起来,组成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成为以前马来亚及现在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见李炯才:《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3~134页。

② 陈剑虹:《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雪兰莪: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版,第96页。崔贵强认为战后初期马来亚华人对于取得当地公民权的态度冷漠,是因为战后中国是五强之一,一般华人在潜意识里仍“以中国籍民自居,落叶归根的观念根深蒂固。战后初期,尽管政局已起了变化,但一般华人并没有及时改变,传统的大国民意识仍然牢不可破”。许多华人认为即使不入马来亚籍,还是可以在当地做生意,而且若能取得双重国籍,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途径”。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版,第153~168页。

③ 因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是华人,战后英国军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接管马来亚初期时,采取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的政策,使得马共得以透过报章发表抨击英国政府的言论,并且成立许多外围组织。1946年至1947年间,马共在全马各市镇与园坵发动工人罢工,并自1948年采取武装抗争活动,使得新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宣布全马进入“紧急状态”,采用高压手段来遏止马共的活动,并为使马共失去援助,强制住在森林边缘的华人搬离到“新村”,以利集中监控。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0, p. 119;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第211~218页。有关华人被集中迁移至新村的情形,参见宋婉莹、林廷辉:《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版。